

# 凭窗读史

2月16日，邹家华同志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9岁。邹家华的父亲是我国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他从小就树立坚定的爱国情怀，立志投身革命事业。邹韬奋与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并称为“七君子”，作为一名文化战士，其精神品格的形成与传承，在家族谱系中呈现出清晰的脉络。

从福建永安的士族家庭，到上海租界的报业斗士，邹氏家族三代人的命运轨迹，恰如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缩影。当我们透过历史，会发现这个家族的文化基因在时代洪流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。



邹韬奋创立的进步文化机构生活书店。

## 百年邹氏：笔端丰碑家国情



《邹韬奋传》书封。

### 从传统士族到现代知识分子

邹氏祖籍江西余江，后迁居福建永安。作为家族第八代传人，祖父邹舒宇通过科举入仕，考取清朝拔贡功名，历任福建永安知县、长乐知县，官至延平知府。他为官清廉，不置产业，这让邹家虽为官家但生活清贫。邹舒宇虽然生活不富裕，但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上心，他秉承中国儒家的教育理念，对几个孩子寄予厚望。任永安知县期间，恰逢长孙邹韬奋出生，家族将此视为“双喜临门”，其任职期间签署的版单执照（注：征收田粮赋税的凭据）等文书成为后世考证的重要史料。告老还乡后，邹舒宇确立“书礼传家”祖训，这种精神深刻影响着后代。

作为晚清候补官员，邹韬奋父亲邹国珍在福建盐务局候补期间，亲历了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。1900年老父退休后，邹国珍带着家眷在福州维持着拮据的家庭生活。尽管经济困顿，他仍坚持传统的教育方式。

沈谦芳的《邹韬奋传》中提到，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，便由父亲“启蒙”，读《三字经》，在“牢狱”般的私塾环境中，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。这种教育与熏陶，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，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。这段描述为我们展现出了邹韬奋那个不怎么快乐的童年，犹如鲁迅等同时代的学者一样，苦涩的童年也影响了他们后来对于教育的思想转变。

邹氏自乾隆年间从江西迁闽，通过“满、玉、隆、有、文、泗、律、宇、国、恩、嘉、庆”的辈分排序维系宗族体系，代代相传。从邹舒宇的“书礼传家”到邹国珍的严苛教育，再到邹韬奋（本名邹恩润）突破父辈期望走上文学道路，三代人完整展现了传统士族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轨迹。

### 严慈相济的精神底色

邹韬奋的童年教育堪称一部“微观版近代启蒙史”。父亲邹国珍的教育方式充满矛盾性：他既是传统儒学的捍卫者，又是新思想的传播者。《邹韬奋传》记载，1909年春，邹韬奋回到福州，原来的私塾老师另谋高就了，新的老师还没请到，他的学业成了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孩子上了洋学堂的邻居来鼓励邹国珍，不如让邹韬奋去洋学堂。邹国珍对此并没有传统儒学捍卫者式的抵抗，而是同意了个建议。就这样，15岁的邹韬奋和他的叔父邹国河一同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，开始走上了西式教育的路线。

邹国珍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矛盾结合体，他们成长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，但晚清巨变也给予了他们新的思考。一方面，他们害怕西方的文化侵蚀了东方的传统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不能无视西方文化带来的先进与强大。出生在新旧相交时的邹韬奋，与他的很多同龄人一样，都面临着新思想和旧习惯的碰撞，这注定了他要在矛盾中成长。好在邹韬奋还有母亲的慰藉，母亲也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

邹母出生于浙江海宁查氏，但具体的名字已不可考，她15岁出嫁，16岁生下邹韬奋，年轻时便承担了家庭的重担。在邹韬奋的童年记忆中，母亲的形象既温柔又坚强。她常常在深夜里为孩子们缝补衣物，额上的汗珠不停地流下，但手上的针线活却从未停歇。这种辛勤劳作的精神，让年幼的邹韬奋感到既心疼又敬佩。他曾在文章中回忆，有一次他半夜醒来，看到母亲



1940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，右起：邹韬奋、长子邹嘉骅（邹家华）、夫人沈粹缜、次子邹嘉驷、前为幼女邹嘉璐。

在灯下做鞋底，心里充满了歉疚和感激。

母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还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。邹韬奋10岁时，背《孟子见梁惠王》这篇文章，只要背不出来就会被父亲打下手板。邹韬奋一次又一次背错，父亲一下又一下地打，他呜咽着背书，母亲也在边上默默流泪。等到背完，被打的右手肿得有一半寸高，而母亲含泪把邹韬奋抱上床，吻了他的额头，让他安睡。

父亲的专断和高压让邹韬奋产生了反抗封建大家长的心理，而母亲的忍让、能干、贤惠都被埋在封建社会的家族里，她不仅没有成为公共社会中的一份子，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。邹韬奋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了旧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，母亲的遭遇为他日后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埋下了种子。

母亲在29岁时便因病早逝，她的去世对邹韬奋来说是巨大的打击，但也让他更加珍惜母亲给予的爱和教育。在母亲的身上，邹韬奋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：温柔、勤劳、坚强和无私。这些品质不仅塑造了他的人格，也影响了他的事业和人生观。

### 烽火中的家风传承

邹韬奋与沈粹缜的婚姻，是知识分子与进步女性携手的典范。据黄国荣著《患难之生：邹韬奋在抗战中》一书，沈粹缜出身苏州，既有传统教育背景，也接触到现代教育，后在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担任美术课主任。婚后她不仅操持家务，管理家中的柴米油盐事，更可以协助丈夫处理读者来信。1936年“七君子事件”期间，她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探监，每次都带着慰问信缝在衣襟夹层带进狱中。这种“以家为战壕”的坚韧，使得邹氏家庭成为特殊的精神堡垒。

邹韬奋与妻子沈粹缜育有三个孩子：长子邹嘉骅（邹家华）、次子邹嘉驷和小女邹嘉璐。每个孩子的名字中都有“马”，寓意着他们是邹家的三匹好马。

1926年10月，邹韬奋先生接手了当时印数只有2800份的《生活》周刊。也正是当月，大儿子邹嘉骅出生。对于31岁的邹韬奋来说，这不能不说是两份同时到来的珍贵礼物。

邹韬奋对孩子的宠爱是显而易见的。无论多忙，他都会抽出时间陪伴他们玩耍。每天晚上，邹韬奋都要先逗逗孩子们，然后才去他的工作室。这种雷打不动的亲子时光，体现了他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孩子的深情。

邹嘉骅从小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，对家里的玩具或其他东西，总是拆拆装装。母亲沈粹缜有时免不了责怪他，而邹韬奋

却笑着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孩子嘛，别把他的兴趣限制死了，顺应其发展吧。”也是在父亲的鼓励下，邹嘉骅一直对机械工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，这种好奇心也让他进一步走向了工业机械的道路。

邹嘉骅的人生轨迹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尤为特殊。据《患难之生：邹韬奋在抗战中》，邹嘉骅的童年颠沛流离，1933年，因国民党迫害，年仅7岁的他随父辗转上海、中国香港等地避难。1941年，邹韬奋因耳疾赴上海治疗，邹嘉骅陪伴在侧，辅助父亲回往复读者来信。面对病痛折磨，邹韬奋仍坚持撰写《患难余生记》，儿子劝其休息，他答道：“时间太宝贵，若此时停笔，恐再无机会完成。”这段对话展现了邹韬奋以文字为武器的执着，也令邹嘉骅深刻理解父亲“以笔报国”的信念。

1944年7月24日，被病痛折磨多年的邹嘉骅，呼吸急促得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弥留之际，他拿起了纸和笔，在妻子、儿子、姐姐和书店里的好友面前，颤抖着手写下了“不要怕”三个字，便与世长辞了。

邹嘉骅在遗嘱中曾说道：“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，如其合格，请追认入党，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。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，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，次子嘉驷研习医学，幼女嘉璐爱好文学，均望予以深造机会，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。”他将自己的事业家庭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，他的孩子们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在工业、科学、文化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能量。邹嘉骅后来延续着童年的爱好，专攻机械制造，赴苏留学，回来报效祖国，逐步成长为工业领域的骨干人才，后来更是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线、国防工业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。

邹嘉骅曾在给父亲的纪念文章《我的父亲邹韬奋》中写道：“父亲因为有这样一种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，才会有坚定的行动，有贯穿一生的坚持，有广大的胸怀。当年，他们‘七君子’获释出狱后，在群众欢迎会上，父亲当场题词：‘个人没有胜利，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’。也因此，他才是伟大的爱国者。”

邹氏家族百年变迁，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士绅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。邹氏家族始终保持两个传统：对文化的敬畏与对民族的责任。祖父邹舒宇品行端正清廉节俭，父亲邹国珍寻求救国之道从传统官宦转为实业经商，至邹韬奋以新闻出版构建舆论阵地，再到邹嘉骅用工业技术实践建设国家，四代人的选择勾勒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路径，邹家几代人实践了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的爱国理想。

梁寻

## 孙犁：循着鲁迅读书



孙犁。

以《荷花淀》等作品闻名的作家孙犁，晚年仍不断有作品刊布。这些作品中，有一类可称为文章文体：书衣文录。书衣者，书之包封也。过去书稀罕，得来不易，不少人得书后便寻合适纸张，在外面再封护一层。从文字看，孙犁一直有此习惯。书籍包封后，成了白面，一般情况，得把作者书名题上。似乎还有余地，孙犁就在上面记点与书相关的文字；或者有感触，也顺手记上。书封就那么大的幅面，无从赘辞赘语，故此，必然实事求是，深感，真情，文字自然简洁更毋庸说，这此文字，选择发表后受到读者喜爱也顺理成章。

在阅读“文录”不同版本时，就有较深印象：其中涉及鲁迅的内容特别多。鲁迅著作、译本、辑录文本不用说，鲁迅提及的古今人物作品，以及与鲁迅相关的人与事，都在这有限的篇幅呈现。无论数量、情感深度，他人无可及。这次翻阅“书衣文录全编”，更加留意到，孙犁收藏的许多书，居然是照着“鲁迅书账”购读。对鲁迅的追随，真可谓亦步亦趋。

此人。此书对了解鲁迅小说的人物原型等，自有价值，可出版时因先期投敌等因素，不宜用本名，故署名“周遐寿”。他去世于1967年，时82岁。大约与鲁迅享年56岁相比，孙犁说他“活得高寿”。从用语看去，孙犁有分明的爱憎。

### 一

《海上述林》，是鲁迅费心竭力亲手编定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。该书在日本印制，印数仅500册，价格十分昂贵。可孙犁当时居然邮购获得：“余在安新县同口镇小学任教时，每月薪金二十元，节衣缩食，购置书籍。同口为镇，有邮政代办所，余每月从上海函购新出版物，其最贵者，莫如此书。”此书出版，国内进步知识分子，莫不向往。以当时而论，其内容固不待言，译者大名，已具极大吸引力；而编者之用心，尤为青年所感激；至于印刷，空前绝后，国内尚无第二本。“余得到手，如捧珍物，秘而藏之，虽好友亦吝于借观也。”

这节文字已大致将此书的珍贵程度和自己的珍惜心情完整展示出来，可惜由于战乱，如此宝贵的著述，结果可想而知：“一九三七年暑假，携之归里。值抗日烽火起，余投身八路军。家人将书籍藏于草屋夹壁，后为奸奸敌拆出，书籍散落庭院。其装帧精致者均不见，此书金字封面，更难幸免，从此不知落于何人之手。”如此珍贵之书，落得如此下场，收藏者心情，可以想见。有趣的是孙犁还对此书有想法：“余不相信身为奸奸者，能领略此书之内容，恐遭毁灭矣。”应该是书籍精美装帧吸引了偷儿，倒并非喜欢书的好读者。笔者以为，孙犁推断，是明道见性之言。

尽管如此，上苍还是垂注爱书人的。1949年，在天津的孙犁去拜访一位友人，居然“见书架上插此书两册”。“我等从解放区来，对此书皆热爱慕而苦于不可得。”同来的友人笑着对孙犁说：“还不走一本！”孙犁还不忍心，只是抽出一册“较旧者”。这样，珍贵的《海上述林》又得获在手。

由书思及时代与人：“青年时唯恐不及时努力，谓之日‘要赶上时代’，谓之日‘要推动时代的车轮’。车在前进……有中途下车者，有终达目的地者，遭遇不同，然时代仍奋进不已。”再到个人：“回忆在同口教书时，小镇危楼，夜晚，校内寂无人。萤火虫灯光之下：一板床，床下一柳条箱。余据一破桌，推书苦读，每至深夜，精神奋发，若有可为。至此已三十九年矣。”这也是他当初购存《海上述林》的情形，与所论人与时代关系比照，感慨甚深。

鲁迅的译本，孙犁也看重。一册《小约翰》：“此鲁迅先生译文之原刊本。我青年时期，对先生著作，热烈追求，然此书一直未读。不认真用功，此又一证。”从照片及清素文字看，孙犁又向借儒者，其实内心热烈又何其甚严。他的文学成就，与他的长久努力密不可分。

### 三

阅读鲁迅日记的读者，都对他每年后面的书账感兴趣。孙犁就是一位追随“书账”的读者。譬如这本《释迦如来应化事迹》：“余不忆当时为何购置此等书，或因鲁迅书账中有此目，然不甚确也。”一本《小学义疏》：“此即鲁迅先生所记尹氏小学大全也。”一

部《越缙堂卷》（晚清李慈铭，越缙堂为其室名）：“鲁迅先生对此日记有微言。”孙犁自己的看法：“然观其文字，叙述简洁，描写清丽，所记事端，均寓情感。”在另一处，孙犁也记述：“倒是越缙堂的日记，名不虚传，自成一格……正像鲁迅所说，他是把日记视为著作的，所以如此细心经营。”处处以鲁迅看法印证。一部宋代朱熹等人编定的《近思录》：“昨日又略检鲁迅日记书账，余之线装旧书，见于书账者十之七八，版本亦近似。”另一本《妙香室丛话》有记：“此等书见于鲁迅书账。余从上海邮致致种……”

孙犁购书，竟然如此循着鲁迅书账。尊崇、追随之忱，无以复加。后面再对自己追随鲁迅的作法自我肯定：“余愈爱吾书，当善保存，以证渊源有自，追步先贤，按图索骥，以致汗牛充栋也。”说自己的书，是“追步”鲁迅“渊源”得来，即使汗牛充栋，只会更增加“愈爱吾书”之心情。堪称忠实的鲁迅信徒。

还有：“鲁迅先生在《买小学大全记》那篇文章中，称赞了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的《清代文字狱档》。由于他的启发，我也买到了一部，共九册。”由一部《日记总论》，孙犁再谈到鲁迅：“《鲁迅日记》，我购有人文两种版本，并借阅过影印本，可以说是阅读多遍，印象甚深。《鲁迅日记》，只记日记，来往，书信，出门办事，学校讲课，买办物品，出入账目。也偶及大事，然更隐晦简略。”多次阅读，是尊崇的一种表达。阅读之余，孙犁还自我反省：“我一生无耐心耐力，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，甚以为憾事。自从读了《鲁迅日记》以后，对日记发生了兴趣，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。”其实，这些“书衣文录”，许多亦可作日记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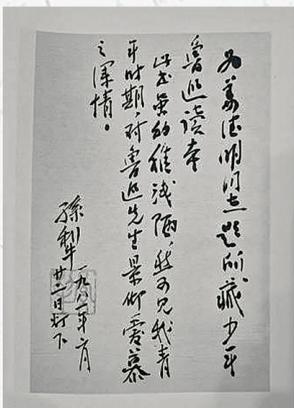
### 四

偶尔写出与鲁迅一致的文字来，孙犁真是高兴：“去岁，为姜德明同志书一小幅，文曰：‘如露亦如电’。附注：‘余读佛经，只记此一语，晚年书之。’姜德明不知佛语出处，孙犁说就不清了。后来他购到一册《唐玄奘集西域记》之《翻经至末尾，四句偈语，赫然在焉。失望之后，恐再遗忘，谨抄存之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’这还不算，在给人人书写这五字后，‘见一图片：鲁迅先生曾为日本僧寮书此五字。余与先生在文字上能有一点同见与同好，实出偶然。然私心亦不免有所惊异矣。’仅仅与鲁迅书写了同样的佛语，孙犁居然认为‘实出偶然’，但又‘不免有所惊异’。对鲁迅的尊崇，几乎有些顶礼膜拜的意味。

对鲁迅作品，孙犁有时会再一再二再三再四。譬如《鲁迅书简》，1974年元月曾包封并题过字；几乎20年后的1993年9月30日，孙犁再次“包以新装”并题字：“鲁迅书信，此编八百多封，人文第一次书信三百多封，第二次一千一百多封。然与此编相较，所增多无关重要。此编成于鲁迅刚刚去世，收信者热情献出，内容多有关鲁迅思想、作风、为文学重要资料，并按人集中排列，看时方便。”把此书特别珍贵之处，价值介绍清楚；对包书时的情形，孙犁也以幽默叙述：“上午，于阳台用细砂纸打磨书顶尘污，略为整洁，并包以新装。”记述颇有画面感；对着天光，把一部看重之书上面的尘污，用细砂纸轻轻打磨……珍惜心情，通过动作表达无遗。

孙犁的书衣文录上，写记鲁迅的文字还有不少，不过一些内容不及前面引述的完整或有意味。孙犁是现当代不多的长久保持高质量创作的作家。由文字、内容两方面看，与他长期从古今经典汲取养分，倾心追随鲁迅这样的杰出大师有关。拈出写于书衣与鲁迅相关的内容，可以部分了解孙犁的思想精神甚至文字来源，对于读者，如何向大师借力，扎实深入读书，也有切实的榜样作用和启发意义。

杨建民



孙犁在《少年鲁迅读本》书衣上的题字。